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希腊哲学史

(修订本)

第一卷

汪子嵩 范明生 陈村富 姚介厚 著



人民出版社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希腊哲学史

(修订本)

第一卷

汪子嵩 范明生 陈村富 姚介厚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崔秀军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哲学史.第1卷/汪子嵩等著.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
ISBN 978-7-01-011020-2

I. ①希… II. ①汪…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哲学史 IV. ①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2263 号

希腊哲学史

XILA ZHEXUESHI

第一卷

(修订本)

汪子嵩 范明生 陈村富 姚介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62.25

字数:880 千字

ISBN 978-7-01-011020-2 定价:16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希腊哲学史》编辑委员会

主 任:汪子嵩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国根	田士章	乔还田	李之美
辛广伟	汪子嵩	陈亚明	陈村富
范明生	姚介厚	黄书元	薛德震

编辑主持:方国根 李之美

本卷责编:洪 琼 崔秀军

凡 例

1. 本书第一版第一卷成书于 1985 年, 1987 年年初出版。为保持全四卷体例的一致, 后三卷沿袭第一卷。修订版基本上维持原来的体例。

1.1 全书按编、章、节、小节分目, 每编附有一个小结。每卷后面附有书目, 人名、神名、地名等译名的对照表。修订版还增加了索引。

1.2 书目仅列举撰写中参阅过的。

1.3 按当时的通例, 凡外文参考书按姓、名、书名、版本、出版社、年代次序列述, 同时译为中文, 作为“书目”附于该卷之后。在脚注中仅出现作者姓氏、书目和页数, 个别同姓氏而本书都加以引证者, 则姓与名同时出现于脚注中。如第四卷中研究原子论的 M.F.Smith, 研究晚古哲学的 A.Smith, 研究教会史的 J.L.Smith。

1.4 考虑到我国读者难以找到外文资料, 所以脚注中除个别国际通用的文献篇名、残篇或纸草文书用英文或拉丁化希腊名称外, 一律译为中文。

1.5 涉及汉文古籍时遵照中国习惯列注人物与篇名。

2. 受研究对象的制约, 本书涉及大量外文资料, 原则上遵循海外通例, 个别依我国实际情况做些变更。

2.1 Diels 和 Kranz 编的《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家残篇》, 按人物列章目, 内分: A. 后人记述; B. 残篇; C. 疑似资料。本书按国际惯例在行文中注释, 如“DK22B49”指该书第 22 章赫拉克利特的残篇第 49 条。

2.2 柏拉图著作按 1578 年斯特方 (Stephan) 的编目, 每页分 A、B、C、D、E

五栏(有的为四栏)。如 189D 指斯特方标准页《柏拉图著作集》第 189 页 D 栏。由于斯特方之后人们发现柏拉图著作的成书时间并非 16 世纪人们排定的次序,所以《柏拉图全集》各篇的斯特方标准页是不连贯的。如 *Timaeus* 篇,后人考证为后期著作,斯特方以为是早期的,标准页为 17A—92D。

2.3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按国际惯例采用 1831—1870 年贝刻尔(Bekker)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集》标准页,每页分 a、b 两栏。如“980a 20”指贝刻尔标准页第 980 页 a 栏第 20 行。按惯例,用小写字母。

2.4 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古代文献,由美国哈佛大学 Loeb 发起和主持,汇编成希英对照和拉英对照两个系列,本书撰稿期间共出版 476 册,之后又有些增补。本书注释通用《洛布希英对照古典丛书》和《洛布拉英对照古典丛书》,在前后文明示所引著作属希英对照或拉英对照情况下,简称《洛布丛书》或《洛布古典丛书》。

2.5 人名、地名中译,基本上采取古希腊语拉丁语的音译。有的按约定俗成处理,如西塞罗,按拉丁语发音,“Cicero”为“Kikero”,目前都用英译发音。

《希腊哲学史》全四卷分别于1987、1993、2003、2010年出版。为保持全书格式的统一,其他各卷大体上按第一卷的体例执行。时隔近三十年,从出版社到作者,不由得产生某种共鸣式的冲动。出版社想在装帧、排版、格式方面“旧貌换新颜”,作者想积30年研究的经历,利用迄今为止掌握的资料和海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做一个较完善的修订本。然而“心想事成”对我们六位原作者而言,仅是个美好的梦想。现实一些,统一全书个别前后不一的译名,更正个别差错或措词,按国际出版惯例增加一个各卷人名、地名、术语索引,这是做得到的。2011年9月哲学编辑室主任方国根向我们转达人民出版社领导决定出全四卷《希腊哲学史》新版的消息,考虑到作者的现实条件,新版不作大的修订,仅作个别更正,统一译名和注释规格,增加索引。

现作如下说明:

1.再版的格式、译名、注释方式仍以第一卷为基础。特别是外文资料的注释,现在通行的方式是用原文全称或缩写。我们当时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情况,都用统一的中译文注释,书后附上译名一致的参考书目。此次再版不做大的更动。四卷中人名、地名、书名中译不一致者一般以第一卷为基础,个别采用后两卷的翻释。例如,地名帕伽马、帕加马、柏加玛,一律采用帕伽马;人名如斐洛、菲洛,一律用斐洛;奥利金、俄里金,一律用奥利金,这是教会史、基督教史方面比较通用的译名。姓名同一者,前面另加学派或地名,如同《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的作者第欧根尼·拉尔修同姓者有好几个,分别译为犬儒的第欧根尼即辛诺普的第欧根尼、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巴比伦的第欧根

尼、塞留西亚的第欧根尼、奥依诺安达的第欧根尼。

2.四卷本原稿从撰稿人、统稿者到责任编辑、编辑室主任,经过好几道手续,此次复查,差错率极小,但是总免不了个别表述或打印方面的差错。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在方国根主任带领下,几人把关,作了更正。撰稿人和读者发现的差错,趁此机会也予以更正。

3.考虑到本书是研究外国哲学的,关于专门术语,从作者到读者都比较熟悉英译,所以索引的排序不用汉语拼音,而用英语字母顺序。索引的格式与海外通例一致。重要的、多次出现的专门术语按内容分类。

4.有关再版的具体工作委托浙江大学陈村富教授负责。索引是王晓朝教授安排他指导的博士后陈玮帮忙做的。周展、陈越骅分别承担第四卷和第一、二、三卷的英文目录。刘永亮、尚万里、徐晓燕承担了核查注释、统一体例等方面许多烦琐而又细致的具体工作。浙江大学还提供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在此均表谢意。

5.《希腊哲学史》是1980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多卷本《西方哲学史》之一。之后《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全四卷《希腊哲学史》新版(原名称“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导读及专题研究”)又陆续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资助,其中第四卷还获得浙江省社科规划办重大项目的资助。在此对上述机构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新版《希腊哲学史》出版之际,自然想到始终如一为我们创造出版条件的人民出版社从社长到编辑以及校对和设计的整个团体。刚完成第四卷接着就出全四卷的新版,是我们做梦都想却不好意思开口的事。初版的四卷五大册,5千多页,而且前两卷当时还没有电子版,工作量可想而知。哲学编辑室主任方国根动员全室力量,各抱一卷重新过目一遍,统一全书格式,耗时一年多成就了这番事业。一个出版社找几位敬业精神的典范不难,难得的是从上到下,从老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几十年如一日持奉这种敬业精神。我们在为人民出版社建社纪念而撰写的《图书出版业的守护神和常青藤》中倾诉了我们二十多年积聚的感受。刻书与收藏起源于古巴比伦和亚述。Nabu是一位刻印楔形文学泥版文书的高手,一生兢兢业业。在

Borsipa 完成了大量口传史诗、铭文、敕令和星相学、天文学的刻印与维护，死后被奉为守护神。之后在 Ashur、Calah、Nineveh 也被奉为刻印业的守护神。近现代发掘的大量楔形文字泥版文书就是在这些地方。后来的希腊人发扬了这个传统。古代各行各业的守护神，其实就是人的敬业精神和理想的外化与升华，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代表某种行业、职业的精神、力量、戒律和守则。常青藤是古希腊酒神的生命不息的象征。本书的再版，再现了这种出版行业的守护神 Nabu 的精神。

借此机会，以我们六位撰稿人的名义，向出版社领导、哲学编辑室历任主任、本书责任编辑、校对、美术设计人员以及所有为本书劳心给力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2011 年 12 月

❀ 前 言 ❀

我们着手编写的是一部预定为四卷本的古代希腊哲学史。编写这样多卷本的断代西方哲学史,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尝试。我们打算怎么写,写成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必须先简单谈谈我们对哲学史的一些看法。

一

哲学史,顾名思义就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古代希腊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开始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它是人类认识历史的一部分,在人类认识史特别是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我们就是想将这一部分人类认识的历史写出来。

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总的方向说,认识是往前进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从比较不正确到比较正确。但是认识发展的情况又是错综复杂的,在前进过程中往往出现曲折反复和倒退。哲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我们写哲学史就是要写哲学认识的这种发展过程。

这点看法本来可以说是哲学史的应有之义,凡是写哲学史的人绝大多数是将哲学史当作哲学认识发展的历史来写的。我们现在所以要重申和强调这一点,主张将哲学史当做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来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看法曾经遭到错误的批判,要以另外一种所谓哲学史的定义来指导研究哲学史,要将哲学史写成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其实践结果

便是将哲学史研究搞成简单化、庸俗化,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习哲学史不但不能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反而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人类认识是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个哲学问题也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本书将以大量材料说明:在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中,开始时分不清物质和精神的区别,后来逐渐将二者区别开来,但还常有混淆不清的情况。早期的希腊哲学家没有留下完整的著作,只有一些残篇;从这些残篇可以看到,在同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中,有些可以说是唯物论的,有些却是唯心论的,并不是前后始终一致的。后来的一些哲学家,特别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影响很大的哲学家,他们留下的著作很多,我们必须从中研究分析他们的思想。本书第二、三卷将以资料表明:柏拉图虽然从总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坚定的唯心论者,但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出过一些重要的唯物论思想,如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的“蜡块说”;亚里士多德的情况更为复杂,在他的著作中有些表现明显的唯物论倾向,有些则表现浓厚的唯心论色彩。对许多哲学家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了事,而是应该对他们的著作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够将哲学史上的复杂事实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解释。

哲学思想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往往受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影响,但是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处理。社会上各种关系是有不同层次的,哲学作为最抽象的思想领域,离开政治和经济基础最远,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发生的偶然性也最多。我们研究哲学史时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经济政治发生激烈转变和动荡的时候,它们对哲学的直接影响就比较明显。在古代希腊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指出两次这样的情况:一次是公元前5世纪开始的,以雅典为中心的智者运动的兴起是和当时民主制的兴盛直接有关的;另一次是在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以后,后期希腊哲学讨论的主题比较集中于伦理问题,产生折衷主义和怀疑论等等思想,可以从当时由希腊到罗马的奴隶制的发展变化中找到原因。虽然如此,要是想为每一种哲学理论寻找政治和经济上的直接原因,也必然是徒劳的。如果采取过去常用的那种“阶级分析”的方法,断定凡是唯物论哲学家必然属于工商奴隶主民主派,是进步的;凡是唯心论哲学家则必然属于反动的奴隶主贵族。这种二分法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

方程式更为容易,可惜它并不科学。

希腊的民主制在历史上当然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但它终究是奴隶主的民主制,它本身有从兴起到鼎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当民主制在雅典发展到最完备的时候,它本身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来了。当时一些哲学家如柏拉图等人对民主政治提出批评,我们怎么能简单地斥之为反动呢?对于古代希腊所称的贵族也要具体分析,有些是原来氏族制的世袭贵族,有些却是希腊人往海外建立殖民城邦时组织和率领群众的领袖人物,也被称为贵族,他们往往是赞成发展工商业的。“贵族政制”(aristocracy)原来的希腊词义就有由具有才德的人统治的意思,相当于“贤人政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这种政制说成是他们理想的政治制度,显然不能和歌颂反动的贵族统治一概而论。在哲学和政治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错误的哲学理论在政治上并不一定都起反动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智者,他们的哲学思想是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推动当时的民主制度的发展上却确实起过进步作用。

研究古代的希腊哲学和研究近代哲学不同,其中主要之点在于古代的历史资料不够完整。我们对古代希腊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从总的方面说是大体了解的,但古代希腊世界范围很大,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在数以百计的希腊各城邦间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有很大差异,它们各自的具体情况是我们今天很难了解的。在不同城邦活动的不同的哲学家的生平,极大多数也只有片段的零碎材料,其中有些还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对于古希腊哲学家除少数有较多材料可供分析外,大多数哲学家的家庭出身、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和他们的政治态度是较难确定的。分析他们的哲学以及和政治有关的思想,其中有些是可以据以判断他们的政治态度的,大多数也嫌根据不足。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以为只能根据历史材料,能够作出判断的就作出判断,能判断几分的就判断到几分,难以判断的就如实说明。近现代中外哲学史家对这些问题往往有不同看法,必要的我们就加以介绍,能作出评价的就提出我们的看法,不然就不作判断。我们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与其没有充分根据而作主观任意的武断,还不如客观地介绍情况、不下判断为好。

二

哲学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类认识的不断前进和深化。

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哲学的范围也是不断变化的。最初古希腊人认为哲学就是智慧,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人类知识领域,然后是一门一门具体的知识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的领域不断缩小,性质也不断改变,以致到今天不同的哲学学派对于什么是哲学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根本对立。研究希腊哲学史可以看到这段变化的最初历程:哲学如何从统一的包罗万象的知识开始逐渐分化,古代哲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如何探索哲学的定义,探讨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的。研究人类认识的这个初级阶段,可以说是探本求源,有助于我们今天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和理解。

哲学思想的发展看起来是十分复杂的,但在庞杂的现象背后却有必然的规律——逻辑可寻。研究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哲学史的工作,阐述希腊思想发展的规律是本书的根本任务。详细说明这些规律要在研究之后,由本书的各个章节特别是最后的结论才能作出的。现在只是为了说明以下的论点,先从一个主要的侧面试图勾画一个最简单的轮廓。

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是从探索客观自然界的“本原”开始的,在探索过程中他们发现了“逻各斯”,认识到自然界是有秩序的,便去寻求客观的必然性,变化背后的不变的“存在”。这种思想受到智者们的挑战。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客观的必然的真理,一切社会政治制度都是根据人的意见制定的,只有人才是万物的尺度,真理都是相对的,他们甚至得出连认识客观事物也是不可能的结论。在他们的推动下,哲学从主要研究客观自然界转到研究人和社会。这时候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们都是针对智者的相对主义,要重新确定必然的定义和规律。他们不但要探寻属于客体的自然规律,而且也寻求属于主体的人和社会的规律、人的认识的规律以及思维的规律,形式逻辑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出现的。虽然古代希腊哲学主要研究的是本体论的

问题,认识论没有像在近代哲学中那样占突出的地位,但有关认识论的思想却几乎是在希腊哲学一开始就已经同时提出来了。当任何思潮达到了顶峰以后,容易走向极端和独断,从而带来了自己的否定。到后期希腊——罗马哲学,怀疑论就以比智者的相对主义更为尖锐和彻底的形式提出来了。他们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以及形式逻辑的规律统统反驳,表示怀疑和否定,得出不可知论的结论。而到最后否定这种怀疑论的却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独断论——从新柏拉图学派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教父哲学。这样,古代希腊罗马哲学也就被中世纪哲学取代了。

勾画这个简单的轮廓是想说明哲学史的发展——也就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即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也就是圆圈式发展的规律。前一阶段的思想为后一阶段所否定,这种否定又遭到再否定。否定之否定好像是绕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但实际内容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认识和哲学思想就是这样曲折反复地前进的。这种发展过程本来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阐述,比如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的相互否定也是服从于这条规律的。我们采用以上的例子,只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说明问题而已。

这种必然的发展规律就是逻辑,也就是辩证法和认识论。这种逻辑当然不是指形式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学说,它既是关于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同时又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它既是客观逻辑,又是主观逻辑;这种逻辑既是辩证法,又是认识论。

这就是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应该说这就是哲学的对象。当然,哲学史要研究的对象比较多,特别是古代希腊哲学史,既要研究一般划为哲学领域的方面——本体论、方法论(包括形式逻辑)、认识论,以及伦理学、美学等领域,还要研究古代的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等后来已不属于哲学的思想领域。但是我们认为,哲学史的主要对象应该是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这三个方面,本书将以论述这三者统一的思想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发展作为主要的任务。

研究人类认识的发展必然离不开范畴。现象世界是无限复杂的,又是不

断运动变化的。人们认识世界必须通过概念,各门科学都有各自的基本概念,通过这些概念认识和掌握现象之网。这些基本概念就是这门科学的范畴。哲学有许多基本范畴,如物质和意识、存在和非存在、本质和现象、运动和静止、一般和个别、有限和无限、一和多、必然和偶然、同和异等等。哲学上的这许多范畴具有最一般的性质,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这些普遍的范畴存在于每一个特殊领域中,但是每一门特殊的科学并不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比如几何学家不研究什么是“相反”、“完全”、“一”、“存在”、“同”或“异”,而只假定它们,并以它们为出发点去进行推理。^① 这些是由哲学家专门研究的,是最普遍的哲学范畴。

讲哲学就离不开这些范畴。哲学家提出的各个基本命题和判断,哲学探讨的各种问题和规律,实际上都是阐明范畴和范畴之间的关系。哲学本体论问题就是讲物质和精神、运动和静止、一般和个别等等范畴之间的关系;讲认识论当然也离不开存在和意识、客体和主体、感性和理性、认识和实践等等的关系。这些范畴本身几乎都是一对对矛盾,哲学正是要说明这些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和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矛盾之间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等等关系。研究这些矛盾的相互关系,本身就是逻辑,也就是辩证法和认识论。尽管现代西方哲学有些流派批判传统的哲学范畴意义不确定(这些范畴的意义本来就是不确定的,因为它们是随着人的认识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这点下文还将专门论述);但是我们很难设想,如果离开所有这些范畴,哲学(也包括持这种批判观点的哲学在内)的分析和论述将如何可能?

任何一种哲学体系都是由许多重要的命题、判断、推理有机地组合而成的。哲学的命题、判断和推理讲的既然是范畴和范畴之间的关系,那么哲学体系归根结底也可以说是由许多范畴关系综合起来的总体。不同的哲学学派、不同的哲学家之间的哲学的不同,往往可以从他们所使用的主要范畴来分辨。或者是他们所使用的主要范畴根本不同,或者是他们给同样的范畴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或者是对同样的范畴作了不同的评价,如唯物论者认为第一性的是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05^a11—13。

物质,唯心论者却认为第一性的是精神。因此我们研究各种哲学思想,不论自觉与否实际上总离不开研究哲学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无论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主要的也是在阐述他们认为是基本的范畴。当然像黑格尔那样地将范畴组织成庞大的哲学体系的还是少有的,但大多数哲学家的核心著作往往就是论述基本范畴及其逻辑关系。早期希腊哲学家只留下一些残篇,其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也就是阐述他们的基本范畴的那些思想,比如米利都学派最早提出的“本原”,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爱利亚学派提出的“存在”和“非存在”,以及原子论哲学家提出的“原子”和“虚空”等等。至于有大量著作留下来的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著作的核心主要讲的也是范畴的逻辑关系,比如柏拉图提出“理念”这个范畴,他的著作主要就是说明理念和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理念和理念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重要的哲学著作,主要就是阐明“存在”和“本体”、“形式”和“质料”、“潜能”和“现实”等构成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哲学史,如果主要不去研究他们讲的这些范畴,又研究什么呢?

任何范畴都不是凝固的、僵死不变的。范畴是人认识现象及其关系的归结,因此当人的认识不断前进和深化的时候,原来的范畴也要随之改变,或者是在原来的范畴上添加新的含义,或者是提出新的范畴代替原来的范畴。哲学史的研究必须重视这些范畴的变化和发展,因为正是这些范畴的变化发展具体地展示了人类认识的发展,以及哲学思想的发展。古希腊哲学家最初提出“本原”这个范畴,要探究万物的根源。一部分哲学家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气、火这类物质性的东西,后来一些哲学家认为本原应该是抽象的不变的东西,爱利亚学派提出了“Being”这个范畴。唯物论哲学家认为这个变中的不变的存在,应该就是组成、构合万物的物质性的元素,于是产生了“元素”这个范畴;从多样的元素到统一的“原子”,达到了古希腊唯物论哲学的顶峰。另一方面,柏拉图却将巴门尼德的“存在”转变成“理念”,创造了古希腊完全意义的唯心论哲学。亚里士多德将“本原”解释为“原因”,他的四因说是企图将他以前的各种有关本原的学说调和在一起,认为唯物论哲学家所说的物质性

元素只是事物的“质料(物质)因”,他所说的“形式”实际上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最后认为只有形式才是事物的“本质”,它是高于质料的。这就说明了他的哲学倾向。

从以上简单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哲学范畴的发展,从“本原”到“存在”到“原因”到“本质”,这个过程和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阐述的过程大体上是符合的,因为黑格尔的逻辑体系本来也是从哲学史上概括出来的。当然二者并不完全一致,比如黑格尔认为只有“存在”才是哲学的起点,而实际的西方哲学却是从探寻“本原”开始的,最初的哲学家首先看到并企图作出解释的,并不是不变的“存在”,而是变化着的万物。具体的历史研究可以纠正黑格尔的抽象的逻辑推论的缺点。

由于以上种种理由,我们确定这部《希腊哲学史》将以阐述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史作为主要的内容,重点说明各主要范畴的最初含义以及它们后来是如何发展变化的。我们试图主要通过这些范畴的逻辑发展过程说明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说明这一阶段人类认识的发展。

在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中探讨这些范畴的逻辑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因为古代希腊哲学属于人类思想史上的童年时期,它们提出的范畴和问题,和后来的哲学相比是较为简单、朴素的,它们原来的含义和变化比较容易看清楚,不像后来哲学中那么复杂。而且西方哲学(直到近现代哲学)经常使用的许多主要范畴,在希腊哲学中大多已经提出来了。研究这些范畴最初提出来的含义及其变化发展过程,对了解西方哲学史,了解后来一直到现代的哲学思想可能是有助益的。

这些范畴发展演化的历史,既具体体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又表现出思维发展的必然规律。这就是一般常说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但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并不是这二者的同一或完全一致。逻辑的发展具有必然性,而具体的历史却充满了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大量的历史偶然事件中又存在着必然性。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又表现为偶然和必然的统一。

哲学思想的发展必然要受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这是一种必然性。但是